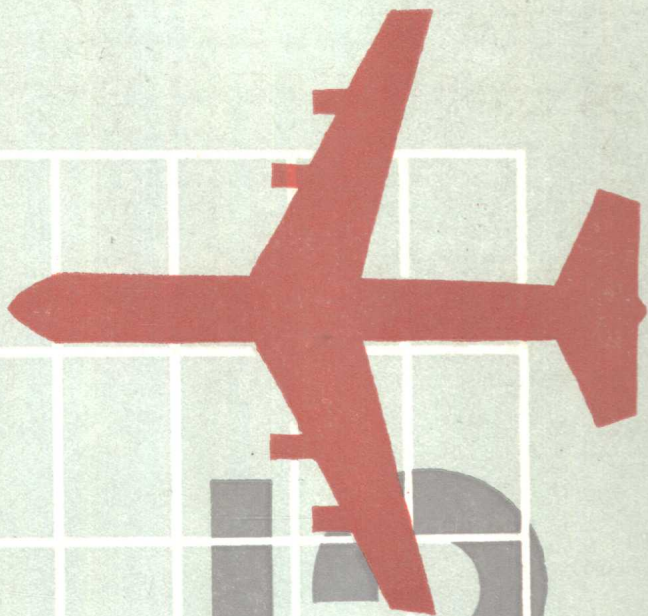




出国留学人员
思想教育十二讲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 国 留 学 人 员
思 想 教 育 十 二 讲

上 海 外 国 语 学 院
出 国 培 训 部 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

**出 国 留 学 人 员
思 想 教 育 十 二 讲**
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西体育会路119号)

上海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6.75印张 173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统一书号：7218·233 定价：1.20元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

陈绪昌	周国良	陆俭家
刘耐风	方之湘	张国钧
赛 晖	汪忠民	胡正豪

参加本书统稿的有：

周国良	陈先进	陆俭家
刘耐风	张国钧	方之湘

序

尽早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改变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态，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为此，我国制定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政策。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引进必要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加速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派遣大批品学兼优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出国留学进修，进一步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这是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国留学人员肩负着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增进与各国人民友谊的双重任务。为了顺利完成上述任务，出国留学人员既要具有一定的外语水平，又要了解我国的国情、现行的方针政策及有关国家的概况和风俗习惯。因此，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对在该院培训的出国留学预备人员开设了《出国留学人员思想教育讲座》。在两年多的教学实践中，本讲座受到了广大学员的欢迎，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事局领导同志对这门课的开设给予了热情的关怀与肯定，并建议培训部对讲授内容作进一步充实、修改，使其更臻完美。

经过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这本教材终于以《出国留学人员思想教育十二讲》为书名与广大读者见面了。纵观全书，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我国出国留学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出国留学人员应有的思想品德修养；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关问题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我国现行的有关方针、政策；三、关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当说，这本书涉

及的内容比较广，理论的阐述和材料的运用也有一定的深度和新意。书的前两部分对其他出国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本书系集体编写，各讲的文风尚有不协调之处，有的讲次理论阐述也显得单薄。这些不足之处，有待作者在今后的实践中作进一步的改进。

《出国留学人员思想教育十二讲》的出版是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相信，今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同志共同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为出国培训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张星棠

1986年5月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目 录

第一讲	浅谈我国的留学历史和现状.....	1
第二讲	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	26
第三讲	出国人员应有的气节和道德.....	40
第四讲	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53
第五讲	谈谈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物质文明.....	66
第六讲	理直气壮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83
第七讲	坚持改革和对外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09
第八讲	“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	127
第九讲	国际主义和我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	146
第十讲	社会制度与科学技术	160
第十一讲	科技发展与思维的演进	180
第十二讲	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工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95

第一讲 浅谈我国的留学历史和现状

我国的对外交往源远流长，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公派出国留学生，也有自费出国留学的。虽然出国留学人员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身分不同，所抱的目的也各不相同，但就其主线看，留学的历史是与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寻求革命真理、振兴中华相联系的。新中国建立后，公派或自费出国留学有了新的起点，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回顾历史，了解现状，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我们从中吸取精神营养，发扬爱国主义民族传统，增强为国争光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一、我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的派遣

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一日，中国三十名英姿勃勃的少年，在上海码头登上一艘美利坚远洋商轮，飘洋过海驶向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公费出国留学学生。

为什么从这时开始成批派遣留学生，而且逐渐形成出国留学的热潮呢？

事情发生的经过，得从当时的我国国内形势说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一个以五千年灿烂文化显赫于世的、为全世界敬畏的天朝大国，竟被名不见经传的外来“蛮夷”接二连三地打得一败涂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象条条锁链把浑沌沉睡的中国捆绑得紧紧的。“华夏”声威一落千丈，由过去的昌盛、至尊一变而为任列强蹂躏、宰割，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清政府的昏聩腐朽、丧权辱国，使我们古老的祖国蒙受旷古未有的奇耻大辱。这一切，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刺激。当时朝野的有

识之士都积极探索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如林则徐、魏源等人，要求清政府改变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愚蠢态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洋人制炮造船，以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他们的主张不为清政府所采纳。随着国内反动统治阶级无耻地借助外国帝国主义的力量扑灭农民革命运动，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一个企图求助于外力振兴清皇朝的官僚集团洋务派，其代表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认为“洋人”厉害，只主张向洋人学习本领，同洋人搞好关系，凡事宁可让步吃亏，决不能同“洋人”斗争。他们极力倡导设立外交机关，开展对外贸易，编练新式军队，兴办工矿、铁路、电报和学校，而其最中心的内容则是购买和仿制洋枪、洋炮、轮船、兵舰，他们的目的，是想以资本主义的“妙策”来医治清政府的痼疾，维持旧社会的秩序。洋务派是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勾结的产物，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中出现的一种政治势力。另外还有一种极端顽固的守旧派，他们站在腐败的统治者立场上，仇视从外国来的一切新的事物，把轮船、铁路、电报、天文、数学等都看作是所谓“变夏从夷”的“奇技淫巧”，妄想阻挡社会的前进。顽固派同洋务派一样，都是清朝的封建统治者，都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所不同的是，顽固派死抱封建教条，讲求“圣人之道”，企图恢复到早期的闭关时代，以保存“天朝”的体制；洋务派是要采用外国的所谓“长技”来防止封建统治的崩溃。两派之间的争吵与斗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所产生的分合现象。当时，掌握清朝最大权力的慈禧太后，深知洋务派拥有军事和地方实力，也希望求得洋人的支持，就使洋务派占了上风。清政府根据洋务派的建议，一八六一年设立了中央外交机关，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八六二年在北京办起了培养外语人材的学校，称“京师同文馆”，开始只设英文馆，以后陆续增加了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东文（日文）馆。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年又在上

海、广州两地分别办起了“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洋务派运动的日益发展，迫切要求成批地派遣青年出国留学，直接从外国学习科学技术。中国首批出国留学生的派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洋务派有它的两重性：一方面，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他们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另一方面，他们把一些有利于建设的東西引进到中国来，如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们这种想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下培养一批人材来搞建设，以“坚船利炮”来挽救危亡命运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但这对打开中外文化交流的门径、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也有其重要作用。

当时世界上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是号称“日不落”的英国，而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却是去美国。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中国与外国订有教育交流条约内容的，只有一八六八年的所谓《中美续约》；二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开创者容闳的积极建议。容闳（一八二九——一九一二）是一个完全由外国人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是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他七岁起在澳门、香港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一八四六年去美国，次年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一八五〇年进入耶鲁大学，一八五四年学成回国。容闳在美国读书期间，正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阶段。他所居住的马萨诸塞州是美国北方的工业中心。他耳闻目睹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应用对社会生活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尽快选派一批青少年学生到美国或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留学。掌握先进技术后，再应用于中国，便可使中国“日趋富强文明之境”。容闳为了把自己的愿望变成现实，建议清政府选派一百二十名，十二至十四岁的优秀青少年出洋留学十五年（每年派三十人，分四年派遣）。经过一番周折，这一建议于一八七〇年获得批准，于是由容闳直接负责组织筹划。首批公费留学生在上海出洋预备局（出国预备学校）短期训练后，于一八七二年到达美国。

二、近代我国留学历史概况

(1) 留学美国

一八七二——一八七五年，中国派出留美学生一百二十人。他们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统一由清政府设立的中国留学事务所监督、管理。从出身看，这批早期留美学生，大都是贫穷人家子弟，因为当时风气守旧，仕进显达多赖八股为敲门砖。地主官僚人家的阔少爷们整天沉缅于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的科举“正途”，他们不屑于向洋人学习所谓“奇技淫巧”，只有家道比较困难的人家才愿具“甘结”，让自己的子弟官费出洋留学。从地域看，大多来自南方地区，计广东籍八十四人，江苏籍二十一人，浙江籍八人，安徽籍四人，福建籍二人，山东籍一人。因为南方地区涉外活动较早，人们思想比较豁达，又因当时中国还没有报纸传播新闻，北方人知道出洋留学之事者不多，所以招生时，北方人报名者极少。从性别看，全是男性。虽然当时沿海一带已有教会办的女子学校，但却没有人愿意把女孩子送到异国他乡留学。在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十分普遍的情况下，清政府也不会招收女生的。

我国早期留美学生面对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科学的发展变化，大多数感受到要学好科学技术，学医、电、农艺、五金采矿、土木工程、铁路建设……，各就所长选择学科，刻苦攻读。这种精神得到美国朋友的称赞，改变了一些美国人的狭隘民族偏见，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朴德曾说：中国留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致于各种科学的进步，成绩极佳，……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

可是，我国早期留美学生在美尚未完成全部学业，即被清政府全部召回。坚持闭关自守的顽固派坚决反对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说什么这是“离经叛道”，是“夷化”，对留学教育事业极尽捣乱破坏之能事。他们派了汉语教师随同出国，以教授汉语为名，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派了理发师傅，为留学生剃头梳辫。还规定遥向清朝皇帝叩头的日期，并且限制留学生同美国人民友好往来。这些都遭到留学生的反对和抵制。一八七六年新到任的留学事务所监督吴子登是个官气十足的顽固派分子，他召集全体留学生到中国驻美使馆训话，见到留学生不按清朝惯例行跪拜礼，不由太怒，认为留学生已被“夷人”同化，目无师长，忘我祖先，即便成材，也不能效忠大清皇朝。他屡次向清政府密告情况，向国内大造舆论，诬陷留学生是“放浪淫佚”，“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皆有不正当之行为。”他要求清政府立即取消留学生制度，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全部留美学生。吴子登的主张得到国内顽固派的支持。一八八一年七月，除因故已撤回或在国外病故的二十六名外，其余九十四名留美学生均离美回国，留学事务所同时关闭。从顽固派分子扼杀留学教育事业的劣迹，可看出清朝政府已腐朽无能到何等程度了。

被清朝政府召回的留美学生虽未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但在美学习多者近十年，少则五年以上，对近代科学技术的掌握已有一定的基础，回国后分别被派往电报局、船政局、机器局、铁路、矿务、水师、医馆等部门实习，后来经过严格考试，成绩很好，李鸿章满意地说：“肄业西学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这批留学生中，除个别的如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成了官僚政客外，大多成为洋务派举办近代工业的技术骨干力量，少数人成绩特别杰出。如詹天佑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爱国科学家，他在主持建造我国第一条重要铁路——京张铁路工程时，依据科学原理，从实际出发，摒弃欧美的老方法，大胆创新，使这条地形险

要，工程浩大的铁路“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而举世闻名。詹天佑是中国科学发展史上和留学生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先驱。他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早期留美教育不仅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材，也为后来大规模的留欧、留日教育提供了借鉴，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容闳倡议选派青少年去美留学之举，为全国开了一个先例，各地的洋务派纷起效法。一八七七年，福建的洋务派人物沈葆楨从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选派三十名学员分别去法国学造船、去英国学驾驶，期限三年，以培养自己需要的船政人材。这次出国留学的年限虽然较短，但收效显著，多数达到了预期的要求，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和造船工业的骨干力量。其中的刘步蟾、林承曾、林永升等人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末爱国海军将领。曾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进分子的代表之一的严复，是去英国学习驾驶的。他在欧洲悉心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说，探索中国复兴的道路，写了不少主张兴办西学、力求自强的文章。他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的《天演论》影响很大，向全国人民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供了理论根据。虽然严复所宣扬的“西学”并没能指明中国真正的出路何在，本人也未赶上时代的步伐，后来走向了保守和反动，但他的许多译著在近代中国人民的思想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批留学英法的学生归国以后，一八八一年船政学堂续派十名学生去这两个国家留学。以后由于发生撤退留美学生回国事件（一八八一年）、中法战争（一八八四年）、中日战争（一八九五年）、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一九〇〇年），以及费用大、路途远等原因，赴欧美留学一度中断。直到一九〇三年后，才继续小规模地派学生到美、英、法、德、比等国去留学。

一九〇八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所谓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来在中国兴办学校和接受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议案，其真实目的是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麻醉和俘虏中国人民。一个长期在中国传教并积极鼓吹“退款兴学”的美国人明恩溥写的《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九〇七年出版）书中，转引了美国伊里诺斯州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中的一段话：

“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道义的、智力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五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通过那种从智力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化一些钱，即使从纯粹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可靠的。”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然后又拔出庚子赔款，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这便是其本质所在。

按照美国所谓“退款兴学”的办法，清政府与美国大使馆商定了派遣留美学生以及在中国举办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的具体办法。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派出一百多人，自一九一二年，头四年每年派一百人，第五年起，每年续派五十，清华学校作为赴美留学预备学校。据统计，到一九二四年止，通过清华学校学习后赴美留学的达一千六百多人，超过同时期留学欧洲的学生人数。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期间，国民党政府每年平均派出二百五十人去美留学。抗战后期到一九四九年，逐年增加人数，累计总数达四千人。据估计，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七十多年间，我国留学美欧学生约三万人，其中留美人数约占三分之二。

留学美欧的知识分子在我国的科技界、医学界、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政治界（民主党派）、工商界有很大影响。他们系

统地接受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头脑中传统的中国封建观念保留较少。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同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势力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希望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政治制度，但绝大部分人具有强烈的热爱祖国的感情。当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时，逐步走向革命的道路。这是留学归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

(2) 留学日本

一八九六年，我国首次派遣十三名留学生去日本，以后不断增加，到二十世纪初，我国青年学生东渡日本留学盛极一时，不仅官方竞相派送，民间自费去的也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一九〇〇年为一百多人，一九〇一年二百八十多人，一九〇二年四、五百人，一九〇三年一千多人，一九〇四年二千多人，一九〇五年八千多人，一九〇六年达一万三千多人（一说二万人以上）。当时全国十八个行政省区都派有留日学生。这种前所未有的盛况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甲午战争失败和八国联军入侵之后，陷于颠簸崩解、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被迫采取新的策略以笼络人心、缓和社会矛盾。一部分权臣疆吏主张把“兴学育才”、广设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作为挽救国家危亡的根本措施，清政府曾多次下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出国，“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颁布了留学生章程，规定留学生毕业归国后可分别获得高爵显职。这些鼓励政策在当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二是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爱国的知识分子投奔海外，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当时出洋留学形成热潮的根本原因。绝大多数留日学生皆以“爱国求学”和“求学爱国”的口号相激励；革命烈士秋瑾的诗句“空负时局忧，无策驱胡虏，……因之泛东海，冀得壮志辅”，倾诉了为挽救祖国危亡去日留学的先辈们的心声；鲁迅说：“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他们跑书店，往集合，听演说，”倡导革命，操之急切，孙中山也说过，“东

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可见，爱国与革命是促成留学热潮的主要根由。

留学热潮的去向之所以集中于日本，这自然与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的风俗习惯比较接近、两国文字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去日本学习省时省费、收效较快等原因有关，主要还由于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日本讲求西学，大著成效”。所以，日本一度成为我国留学生的荟萃之地。

从一八九六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的四十二年间，我国去日本的留学生大约有五万人之多。他们大多怀着救国的志愿和旺盛的求知欲而刻苦求学。许多留学生参加了各种革命活动。他们大量翻译资产阶级启蒙著作。据一九〇四年统计，我国已翻译的世界各国书籍共五百三十三种，其中三百二十一种是留日学生从日文翻译或转译过来的。留日学生编印了多种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报刊，如《国民报》、《中国新女界杂志》、《云南》、《四川》、《二十世纪之支那》（即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前身）等。他们积极投身到反帝斗争的浪涛中去：一九〇三年为反对沙俄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掀起了拒俄运动；一九〇五年参加了反美爱国运动；一九〇五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领导成员中有留日学生吴玉章、黄兴、陈天华等；同年，为抗议日本政府应清政府镇压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的请求而颁布的“取缔规则”，决定罢学回国，不在日本求学受辱，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日本政府承认了中国留学生活动场地合法存在的权利。“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早期的马列主义宣传家李大钊、周恩来、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都是留日学生，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我国左翼理论文化界的著名人物郭沫若、邓初民、夏衍、艾思奇、周扬等也都曾经是留日学生。

概括地说，中国留日学生对人民民主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有两个方面：

一是开辟了我国民主革命的海外基地，培养了大批民主革命的骨干队伍。本世纪初，我国留日学生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自一八九五年后几次到日本，希图交结日本友人，联络华侨发展“兴中会”、建立革命基地，但直到一九〇〇年时，这一目的未能达到。一九〇三——一九〇六年间，大批青年到达日本留学。他们组织各种团体，面对祖国危亡的现状，宣传革命主张。一九〇五年孙中山从欧洲重去日本时，留日学生推派代表一百多人往横滨欢迎，并在东京召开数百人的欢迎会。这种空前盛况的出现，固然是由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更重要的还是由于留日学生中的民主革命思想和活动声势在日本华侨中赢得了绝对优势，一度把东京变成了中国革命党人的集中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基本队伍和骨干力量都是在这期间成长壮大的。最初代表革命派的各种革命团体多为留日学生组织和首先发起的。中国同盟会首先就是在留日学生中成立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也几乎都是留日学生。他们为唤起“睡狮”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二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南陈北李”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陈独秀（一九〇一——一九一三年留日），在“五四”时期所以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同他在日本受到科学、民主与社会主义思潮的熏陶有相当的关系。李大钊（一九一三——一九一六年留日）在日本期间听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讲课，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回国后成为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李达、周恩来、李汉俊、陈望道、彭湃等都曾留学日本。李达留日七年，他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比较系统地向国内介绍